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何以影响审计整改质量？

——兼论政府在落实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

上官泽明, 闫毅茹, 贾龙飞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 审计整改是国家审计的“后半篇文章”, 审计整改责任的划分是审计整改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而本级政府在审计整改涉及的诸多主体中承担着审计整改的组织领导责任。基于各省先后建成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 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有效提升审计整改质量, 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可以赋能政府在落实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机制检验发现,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引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增强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异质性分析表明,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人大预算监督较弱和未来导向较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审计整改质量的效应、机制和情境, 为做好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推进审计整改标本兼治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 审计整改质量; 组织领导责任; 监督管理责任; 监督检查责任; 公众舆论压力; 整改主体责任

[中图分类号] F2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3114(2026)04-0010-13

一、引言

国家审计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而审计整改则是国家审计“治已病”“防未病”功能落地的关键所在。2023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与揭示问题“上半篇文章”同样重要, 必须一体推进^①。审计整改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多元主体^[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21年7月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审计查出问题整改长效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专门明确了两个层次、六大主体的责任机制。其中, 第一层次聚焦于健全审计整改的领导、监督和落实机制, 具体是健全党对审计整改工作的领导机制、健全人大常委会对审计整改工作的监督机制、健全政府对审计整改工作的落实机制; 第二层次则是聚焦于健全审计整改的责任机制, 具体是夯实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压实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②。在此背景下, 一些文献研究了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因素, 如认为全社会互联网的发展可以成为审计整改质量提升的新动能^[3], 公众诉求可以推动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表明“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可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4], 但这些文献没有关注到政府在推进审计整改中的统筹落实责任。实际上, 政府这一主体在审计整改中起着关键作用, 既要接受党的领导, 也要接受人大的监督, 还要通过组织领导主管部门、被审计单位和审计机关去落实审计整改。换个视角来看, 在审计整

[收稿日期] 2025-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JY064)

[作者简介] 上官泽明(1989—), 男, 山西临汾人,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审计与财政治理, 邮箱: 365088391@qq.com; 闫毅茹(2000—), 男, 山西孝义人,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 贾龙飞(1997—), 男, 山西侯马人, 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

① 详见: https://www.qstheory.cn/dukan/qs/2023-10/31/c_1129947183.htm。

② 详见: <https://sjc.gsfc.edu.cn/info/1202/1466.htm>。

改中,本级党委承担的领导责任表现为重大事项决策责任,本级人大承担的是监督责任,本级政府承担的落实责任则是组织领导责任^[5]。尽管现阶段审计整改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改而又犯”的“老大难”问题,如预算编制不够细化、转移支付归类标准不一等^①。那么,应当如何继续增强本级政府在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持续提升审计整改质量呢?

当前,数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面融入政府治理的各个领域,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已经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将“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列为主要任务,加强了对公共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②。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继续提出要“有序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具体是要“健全公共数据开放政策体系,明确公共数据开放的权责和范围”^③。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提升政府决策的准确率与科学性,增强政府管理效能^[6],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作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能够推动治理结构向多元化和扁平化方向发展,并显著提升财政透明度^[7],从而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从现实情况看,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内容,实际上也包含着很多与审计整改相关的内容。例如,北京市2021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提到政府采购政策存在执行不严格的情形,具体是“2家单位未严格履行政府采购程序,将7个属于政府采购范围的事项直接指定所属二级单位或其他单位承担……”^④那么,如果想了解前述2家单位的整改情况是否真实、到位,就可以在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查询与验证“采购”相关的整改情况。搜索“采购”这一关键词,截至2025年12月可以查到的信息共有13条,其中,2022年有2条信息,2023年有5条信息,2024年有1条信息,2025年有5条信息^⑤。进一步,想验证A单位2021年度审计发现的采购问题的落实整改情况,就可以继续将A单位的具体采购信息与之前提交的审计整改报告进行比对,以验证其是否进行了真实整改。那么,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建设能否以及如何推动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2011—2023年各省先后建成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准自然实验考察以下问题: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否赋能政府在落实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进一步,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提升审计整改质量的作用机制是什么?在不同情境下,上述提升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性?

本文可能的贡献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构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与审计整改质量的研究框架,实证检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如何赋能其在落实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不仅丰富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后果研究,也拓宽了审计整改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为公共数据开放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提供新的经验证据。(2)以交叉理论视角深入聚焦审计“后半篇文章”,揭示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如何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引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增强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主体责任,进而提升审计整改质量,为理解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如何提升审计整改质量提供系统的理论解释。(3)基于政府承担审计整改组织领导的独特视角,强调并论证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在审计整改闭环中的关键驱动地位,为优化审计整改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思路。(4)结合审计整改实践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制度环境、人大预算监督、未来导向文化价值观等不同角度分析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差异化影响,为不同场景下完善公共数据开放相关政策、提升审计整改质量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

①详见:<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877568983832848&wfr=spider&for=pc>。

②详见: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5/content_2929345.htm。

③详见:https://www.gov.cn/gongbao/2024/issue_11666/202410/content_6983475.html。

④详见:https://sjj.beijing.gov.cn/zwxx/sjgg/202207/t20220728_2781520.html。

⑤详见:<https://data.beijing.gov.cn/gjss/index.htm?%E9%87%87%E8%B4%AD>。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系统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

根据系统论,每个系统都是由若干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审计整改作为一项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有机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和开放性等体系特征^[8]。在审计整改系统内部,政府既要接受党委领导和人大监督,又要统筹主管部门、审计机关、被审计单位落实具体整改任务,成为串联各主体的核心枢纽,相关责任主体则承担功能执行职能。社会公众作为非正式监督主体,其舆论压力已经成为审计整改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子系统。

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审计整改涉及的诸多主体中,各方掌握的信息参差不齐,导致审计整改系统整体效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过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各方能够获取更全面、更及时的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判断偏差,从而提高审计整改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驱动审计整改质量提升的动态演化链条,围绕主管部门、审计机关、社会公众舆论、被审计单位的行为互动与策略调整逐步展开,形成“信息赋能—监督强化—舆论施压—责任落实”的递进关系。这一演化链条中,主管部门的监管升级是传导起点,为后续监督与舆论提供方向;审计机关的监督强化是核心支撑,为监管与舆论提供数据验证;社会公众舆论是压力放大器,将监督效力传导至被审计单位;被审计单位的责任落实是最终落点,直接决定审计整改质量,而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成效又会反向优化主管部门的监管策略、审计机关的监督重点与社会公众的舆论方向,形成闭环式动态演化。

因此,本文将基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视角,分析其如何影响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审计机关强化监督检查责任、社会公众诉求引发舆论压力、被审计单位夯实整改主体责任,从而对审计整改质量产生影响。

（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与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会改善主管部门督促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整改的态度。对违法违纪现象的审计整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级主管部门对被审计单位施加的压力^[9]。当审计整改事项涉及监管事项时,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督促被审计单位落实好审计整改,并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公开相关信息,以更好地展现对被审计单位完成审计整改的监督责任落实情况。例如,医保基金违规是各省医保审计中发现的常见问题,2022年广西医保基金审计发现了居民医保基金存在未转入财政专户管理、未及时转存银行定期以及存款未享受优惠利率等问题^①。在后续整改过程中,广西医保局作为主管部门,依托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调用相关共享数据,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以此强化对医保基金监管、经办服务整改的监督管理^②。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促进主管部门根据审计发现的共性问题完善行业管理。当审计机关发现的问题具有共性特征时,这意味着行业中存在体制机制性问题,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把审计整改情况作为优化行业管理的重要依据^[5]。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和发布的重要政策制度是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中的重要内容,外界可以通过查阅相关政策制度的出台和修订情况,了解行业主管部门对审计发现共性问题的整改情况。主管部门通过公共数据平台披露新修订的相关规章制度,可以对问题易发、高发的领域和岗位实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做到“治已病”和“防未病”。

（三）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与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提升审计机关全面获取整改信息的效率。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可以解放审计人员,提升审计效率。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审计机关可以直接调取开放的财政预算、项目审

①详见:https://view.inews.qq.com/k/20230906A091RS00?no-redirect=1&web_channel=wap&openApp=false。

②详见:<http://www.gxzf.gov.cn/gxyw/t17589916.shtml>。

批、资金拨付、民生保障等公共数据(如政府采购数据、财政专项资金流向数据)。例如,襄阳市审计机关借助襄阳市政务大数据共享开放平台,实现“云上”采集、“云上”分析、“不下云”即可生成疑点表^①。襄阳市审计机关的审计需求数据自然也包括以往年度发现问题的审计整改数据,这些数据有助于审计机关提高对审计整改情况监督检查的效率。

第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促进审计机关对整改情况进行多维度交叉验证。在数字治理背景下,审计机关依托数据要素共享平台,能够为审计效能的提升提供关键支撑^[10]。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普惠性的数据资源平台,提供了大量涉及公共服务事项与政府管理等领域的的数据。审计机关通过将审计单位的整改报告数据(如“某违规资金已追回”)与公共数据(如国库资金入库数据、银行流水数据)交叉比对,可快速验证整改的真实性。例如,若被审计单位声称“拖欠的民生补贴已发放”,审计机关可通过开放的社保系统数据、银行代发数据直接核查,避免“纸面整改”。

(四)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公众舆论压力与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降低了社会公众参与审计整改监督的成本。数据要素具有高共享、可复制的特点,能够提高政府透明度,从而有利于社会公众参与对政府的监督。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社会公众可以借助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审计整改情况,关注被审计单位整改落实情况并发表自己的态度。例如,2023年度杭州市审计工作报告指出了“部分环境保护政策执行不严格”的问题^②,而在2024年12月23日就有社会公众向杭州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申请了解“西湖环境监测数据”,杭州市生态环境局则在2025年1月14日就向该名公众反馈了相关情况^③。

第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放大了社会公众对审计整改形成的舆论效应。一方面,公共数据极大地保障了公众对数据要素的使用权^[11],对推动社会公众利用政府数据参与治理有重要作用。互联网及数字化工具的普及拓宽了公众监督审计整改的渠道,从而将整改压力传导至整改进展缓慢或者整改问题严重的被审计单位。出于维护自身形象和避免负面影响的需要,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通常会亲自督促审计整改落实工作。另一方面,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推动审计“持续整改”。公共数据开放为社会公众持续跟踪被审计单位的整改动态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使公众诉求能够得到合理充分的表达;对于综合性强、复杂性高,或者存在体制机制性的问题,通过舆论压力可以推动持续性整改,充分发挥舆论效应。

(五)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与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推动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整改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在审计整改系统中,被审计单位作为整改主体,其主要负责人承担整改首要责任^[2]。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提供相关政府部门和单位的数据以及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关系或与政府相关的企业数据。具体来看,外部主体可以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发布的相关信息,及时了解和分析被审计单位主要负责人是否召开审计整改专题工作会议,是否及时研究和部署审计整改工作,是否亲自抓审计整改落实,进而对被审计单位负责人“施加”一定的压力,促使其更加重视审计整改工作的落实。

第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推动被审计单位更好地落实审计整改台账等整改工作。以往实践中,部分被审计单位抱有侥幸心理,在完成审计整改书面材料上报后,很少主动向外公布整改情况,这就容易导致被审计单位进行虚假整改和敷衍整改。在审计整改领域,通过建立审计整改管理台账,可以实现审计查出问题整改情况的全过程线上管理和流程化跟踪^[12]。随着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进一步建设,特别是审计整改台账的责任分解、措施和期限的公开,被审计单位需要切实按照审计整改台账中的责任、期限去落实整改,这可以有效推动整改情况的公开透明化。

①详见:http://sjj.xiangyang.gov.cn/zxzx/gzdt/202311/t20231130_3522697.shtml。

②详见:https://sj.hangzhou.gov.cn/art/2024/10/9/art_1229438167_58896573.html。

③详见:<https://data.hangzhou.gov.cn/dop/tpl/helpCenter/dataDemandList.html?pageName=dataDemandList>。

综上,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引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增强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的主体责任,推动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结合前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H:

H:其他因素相同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23 年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下统一简称“省份”)的面板数据。由于上海市和北京市在 2012 年就推出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样本区间的起始年度应不晚于 2012 年;考虑到最近一次修订的《审计法实施条例》是在 2010 年 5 月开始实施的,故本文将《审计法实施条例》的下一年 2011 年作为样本的起始年度。同时,最新出版的《中国审计年鉴 2024》统计的是审计机关 2023 年的数据,因此,本文的样本截止时间为 2023 年。由于被审计单位完成审计整改通常是在政府组织领导审计整改工作之后,本文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这一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样本数为 372;由于西藏自治区在 2013 年的数据存在缺失,因此剔除了西藏自治区 2013 年的样本数据,最终确定的样本数为 371。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时间根据公开报道进行手动收集,并利用郑磊和刘新萍主编的《中国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报告(2023)》^[13]进行验证。审计整改质量的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其他数据取自《中国财政年鉴》等。

(二) 研究变量的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审计整改质量(*AQR*)。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最新重要论述,国家审计质量可以分为对应审计“上半篇文章”的审计揭示问题质量和对应审计“下半篇文章”的审计整改质量。

在历年《中国审计年鉴》的《审计工作综合情况统计表——地方审计机关》部分,“审计处理结果落实情况”指标(对应为一级指标)的“审计促进整改落实有关问题资金”子指标(对应为二级指标)与审计整改质量更加密切相关,该子指标又包括“已上缴财政”“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已归还原渠道资金”等指标(对应为三级指标)。由于审计长经常在全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增收节支”^①(即“已上缴财政”“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已归还原渠道资金”三项指标之和)来反映审计整改成效,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14],使用上述金额之和取对数来衡量审计整改质量。

2. 解释变量:政府公共数据开放(*AGD*)。

本文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将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定义为虚拟变量。对各省实施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的地区取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本文借鉴池国华等^[15]、罗春华等^[10]的做法,选取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对外开放程度(*FDI*)、政府规模(*Gov*)、城镇化水平(*Urban*)、财政赤字率(*Deficit*)、互联网发展水平(*Int*)、人大的审计需求(*FER*)、被审计单位数(*LndNum*)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衡量方式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和说明
审计整改质量	<i>AQR</i>	已上缴财政、已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已归还原渠道资金之和取对数
政府公共数据开放	<i>AGD</i>	各省公共数据开放实施当年及以后取值为 1,其余取值为 0
经济发展水平	<i>LnPGdp</i>	各省人均生产总值取自然对数
对外开放程度	<i>FDI</i>	外商投资额(亿元)按汇率折算后取对数
政府规模	<i>Gov</i>	财政支出/GDP
城镇化水平	<i>Urban</i>	城镇人口数/年末常住人口数
财政赤字率	<i>Deficit</i>	(财政支出 - 财政收入)/GDP
互联网发展水平	<i>Int</i>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取对数
人大的审计需求	<i>FER</i>	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被审计单位数	<i>LndNum</i>	被审计单位数的自然对数

①详见: <https://tv.cctv.com/2022/01/07/VIDESvvVt8lewXnbXxCwxUTZ220107.shtml>。

(三) 实证模型的设计与检验思路

基于前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造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考虑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往往对下一年的审计整改质量产生影响,本文将各省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时间滞后一期处理。其中, $AQR_{i,t}$ 表示*i*省份*t*时期的审计整改质量, $AGD_{i,t-1}$ 代表*i*省份*t*-1时期政府公共数据开放, $Controls_{i,t}$ 代表影响审计整改质量的其他因素, γ_i 和 δ_t 分别表示省份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为便于表述,后文将使用 L_AGD 替代模型中的 $AGD_{i,t-1}$ 来代表滞后一期的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模型还对标准误进行省份层面的聚类处理。

$$AQR_{i,t} = \alpha_0 + \alpha_1 AGD_{i,t-1} + \sum a_j Controls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审计整改质量(AQR)的最大值为15.555,最小值为6.628,这表明我国各省之间的审计整改质量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_AGD)的均值为0.307,表明受到政府实施公共数据开放政策效应影响的样本观测值占比为30.7%。被审计单位数的最大值为9.759,最小值为4.263,这表明各省份之间的审计工作量大有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审计整改的执行力度。其他控制变量的分布均在正常范围内。

(二) 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为加入与审计机关特征无关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_AGD)的系数为0.237且在10%水平上显著,初步支持了假设H。列(2)为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L_AGD 的系数为0.258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H,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赋能政府落实审计整改的组织领导责任,从而促进审计整改质量的提高。

(三)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DID方法的重要前提是实验组与控制组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即地方政府搭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后,公共数据开放才会对审计整改质量产生影响。基于此,设置以下虚拟变量: $Before3$ 表示数据开放平台构建前的第三年及之前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Before2$ 表示数据开放平台构建前的第二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考虑到样本时间跨度和多重共线性,将政府实施公共数据开放政策的前一年作为基期对照。 $After1$ 表示数据开放平台构建后的第一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After2$ 表示数据开放平台构建后的第二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After3$ 表示数据开放平台构建后的第三年及以后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4的列(1)报告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Before3$ 、 $Before2$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表明实验组与控制组在公共数据开放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After1$ 、 $After2$ 、 $After3$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公共数据开放之后,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审计整改质量有显著差异。这一结果说明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AQR	371	13.225	1.292	6.628	13.399	15.555
L_AGD	371	0.307	0.462	0.000	0.000	1.000
$LnPGdp$	371	10.934	0.453	9.849	10.897	12.207
FDI	371	8.834	1.619	4.268	8.862	13.440
Gov	371	0.276	0.188	0.107	0.227	1.334
$Urban$	371	0.603	0.126	0.228	0.597	0.896
$Deficit$	371	0.175	0.196	0.013	0.125	1.221
Int	371	6.709	1.018	2.839	6.794	8.481
FER	371	2.639	1.709	1.074	2.247	14.435
$LnNum$	371	7.890	0.963	4.263	8.093	9.759

表3 实证结果

	(1) AQR	(2) AQR
L_AGD	0.237* (1.712)	0.258* (1.893)
$LnPGdp$	2.076 (1.649)	2.178* (1.789)
FDI	-0.006 (-0.125)	0.005 (0.109)
Gov	4.683* (1.735)	4.283 (1.604)
$Urban$	-13.024** (-2.719)	-12.365** (-2.521)
$Deficit$	-7.309*** (-3.806)	-6.793*** (-3.557)
Int	0.395 (0.784)	0.410 (0.811)
FER	0.242** (2.222)	0.238** (2.044)
$LnNum$		0.243 (1.682)
时间固定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Cons$	-5.169 (-0.412)	13.965* (1.844)
N	371	371
R^2	0.227	0.236
Adj_ R^2	0.186	0.193
F	21.627	25.377

注:***、**、*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t值。标准误为省份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下同。

2. PSM-DID 检验

为缓解样本自选择偏差的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前文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规模、城镇化水平、财政赤字率、互联网发展水平、人大的审计需求和被审计单位数作为协变量,以 0.05 作为卡尺,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数据进行 1:2 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在此基础上采用匹配之后的样本进行 PSM-DID 模型回归,剔除未匹配数据后最终得到 273 和 361 个样本。回归结果见表 4,列(2)为最近邻匹配的回归结果,列(3)为半径匹配的结果,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变。

3. 调整样本范围或区间

(1) 调整样本范围

考虑到 2015 年《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提出江苏、浙江、山东、广东、重庆、贵州和云南等 7 个省市开展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试点改革^①,可能会影响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治理效应。为了排除这一因素影响,本文将这 7 个试点改革省市的样本数据剔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4 的列(4)所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_AGD)的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2) 调整样本区间

考虑到 2021 年 6 月《“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在第十五部分“全面加强审计业务管理”中专门提到“加大审计结果公开运用和审计整改情况公告力度”^②,可能会影响审计整改与信息公开力度,本文进一步剔除 2021 年以后年份样本重新进行回归。表 4 的列(5)为调整样本区间的回归结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_AGD)的系数显著为正,再次表明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安慰剂检验

为控制遗漏变量和随机扰动项对样本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效果的偶然性加以识别。参考沈坤荣和林剑威的做法^[16],对样本内各省份进行重复 500 次的随机抽样回归,得到 500 个回归系数所对应的 P 值和系数分布。安慰剂检验结果如图 1 所示,回归系数

表 4 稳健性检验(一)

	(1)	(2)	(3)	(4)	(5)
	AQR	AQR	AQR	AQR	AQR
L_AGD		0.344 ** (2.392)	0.247 * (1.756)	0.486 *** (3.423)	0.294 * (1.985)
$Before3$	0.077 (0.388)				
$Before2$	0.020 (0.153)				
$Current$	0.146 (1.081)				
$After1$	0.279 * (1.963)				
$After2$	0.554 ** (2.580)				
$After3$	0.539 * (1.94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1.275 (0.112)	-14.368 (-1.123)
N	371	273	361	287	309
R^2	0.820	0.829	0.811	0.258	0.282
Adj_R^2	0.788	0.795	0.780	0.202	0.237
F	10.373	4.042	8.377	113.812	16.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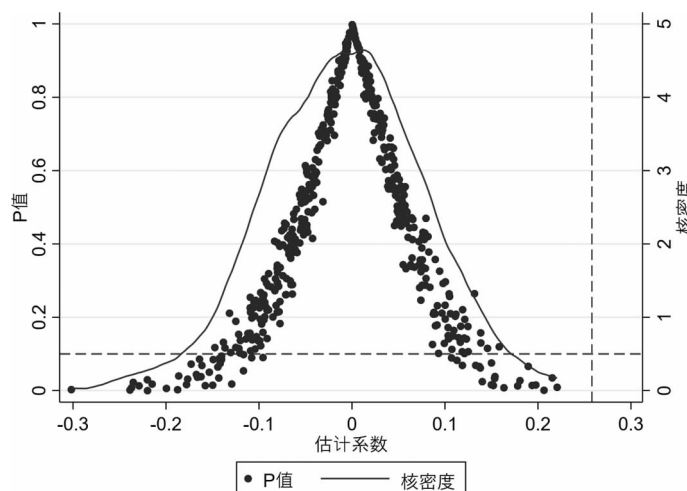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

①详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15-12/08/content_5021393.htm?_f_link_type=f_linkinlinenote&flow_extra=eyJkb2NfcG9zaXRpb24iOiJAsImRvY19pZCI6ImY5NGFiODAwMzc4ZDhkYWQtNzEyMzNjNDFlkOGNiZGEzOSIsImlubGluZV9kaXNwbGF5X3Bvc2l0aW9uIjowfQ%3D%3D。

②详见: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6/28/content_5621230.htm。

的均值接近于0且服从正态分布,P值多大于0.1,这说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并非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上文得到的结论可靠。

5. 考虑遗漏重要变量

2021年新修正的《审计法》专门新增了与审计整改有关的内容,其中第五十二条内容就包括“审计结果以及整改情况应当作为考核、任免、奖惩领导干部和制定政策、完善制度的重要参考;拒不整改或者整改时弄虚作假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①。可见,在审计整改的责任追究制度下,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会对审计整改质量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考虑增加与官员晋升激励密切相关的省长变更(*Gov_cha*)和省长年龄(*Gov_age*)、省委书记变更(*SPC_cha*)和省委书记年龄(*SPC_age*)等控制变量。具体如下:对于行政首长的变更,本文借鉴徐玉德等的做法^[17],若新行政首长在当年的1月至6月任职,则为变更年度,若在当年的7月至12月任职,则下一年度为变更年度。回归结果见表5的列(1)至列(5),其中列(1)至列(4)为依次加入省长变更、省长年龄、省委书记变更和省委书记年龄的回归结果,列(5)为同时加入上述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排除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再次说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二)

	(1) <i>AQR</i>	(2) <i>AQR</i>	(3) <i>AQR</i>	(4) <i>AQR</i>	(5) <i>AQR</i>	(6) <i>AQR</i>
<i>L AGD</i>	0.260 * (1.909)	0.258 * (1.900)	0.260 * (1.903)	0.252 * (1.836)	0.259 * (1.902)	0.258 ** (2.251)
<i>Gov_cha</i>	0.106 (1.523)				0.130 * (1.821)	
<i>Gov_age</i>		-0.002 (-0.131)			0.001 (0.043)	
<i>SPC_cha</i>			-0.033 (-0.587)		-0.061 (-1.010)	
<i>SPC_age</i>				0.010 (0.845)	0.009 (0.68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8.544 (-0.720)	-8.629 (-0.712)	-8.610 (-0.718)	-9.187 (-0.773)	-8.745 (-0.722)	-8.717 (-0.826)
<i>N</i>	371	371	371	371	371	371
<i>R</i> ²	0.241	0.237	0.237	0.238	0.244	0.236
Adj- <i>R</i> ²	0.195	0.191	0.191	0.192	0.192	0.193
<i>F</i>	22.502	28.750	24.902	25.885	26.104	
Wald Chi2						92.24
Prob > chi2						0.000

6. Bootstrap 抽样

本文使用省级层面数据进行研究,样本量相对受限,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对所得结果进行 Bootstrap 稳健性检验。通过 Bootstrap 抽样重复抽取可放回的原始样本,据此得到待估统计量,本文重复上述操作 *N* 次(*N* = 1000)。回归结果见表5的列(6),Bootstrap 下的估计结果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影响更加显著,说明假说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即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于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7.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参考张建翔和王茂光的做法^[18],选取各地区地形起伏度作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IV*)。从逻辑上来说,在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框架中,地形起伏度常作为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因素,进而通过政策资源倾斜影响公共数据开放。从该方面讲,选用该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同时,地形起伏度是每个地区的地理特征,难以直接对审计整改质量产生影响,满足外生性要求。考虑到地形起伏度为非时变变量,本文参考谌仁俊和周双双的做法^[19],将其与政策时期虚拟变量(*POST*)进行交乘,生成具有时变特征的工具变量。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的列(1)和列(2)。列(1)为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具有较

①详见:<https://www.audit.gov.cn/n10018889/n10137162/n10137201/c10191187/content.html>。

强的相关性,且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11.629, P 值为 0.0006,拒绝不可识别假设, Cragg-Donald Wald F 值为 26.621,大于 Stock-Yogo 弱识别检验 10% 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 AGD*)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因素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仍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再次说明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五、进一步研究

(一) 机制检验

前文的理论分析中提到,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引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增强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的主体责任来推动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因此,本文借鉴江艇提出的检验方法^[20],构建模型(2)对机制进行检验。

$$M_{i,t} = \beta_0 + \beta_1 AGD_{i,t-1} + \sum \beta_j Controls_{i,t} + \gamma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M_{i,t}$ 为机制变量,包括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公众舆论压力和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其余变量与基准模型相同。

1. 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

审计机关在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提出的建议,会通过审计报告等渠道反馈给主管部门^[21]。主管部门会依据报告所反映的问题与建议,进行批示或加以采用。其中,对问题的批示体现了主管部门对审计发现问题的主动响应,通过进行批示可以明确整改要求、责任主体和时间节点等关键要素;对建议的采用则反映了主管部门对审计成果的系统性运用,即将审计报告及专项调查报告中的结论、建议纳入日常监管、政策修订或制度完善中。因此,本文使用“被批示、采用的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的增长率来衡量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责任(*PSCY*)^①。具体回归结果见表7的列(1),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 AGD*)的系数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

2. 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

从政策法规依据来看,往期审计问题的整改情况是历年审计工作的重点核查内容。因此,本文使用审计揭示问题质量来间接衡量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

第一,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作为审计机关成果利用制度的重要形式之一,是审计机关在完成具体项目、系统分析审计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全局性和建设性的书面报告。作为审计机关履行监督职能的核心成果载体,其提交的数量能够直观地反映审计机关主动履行监督检查责任的力度与能力,因此,以“提交审计专题、综合性报告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JDJC1*)^②。回归结果见表7的列(2)。

第二,审计建议的提出是审计机关根据审计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及办法,能够有效

表6 稳健性检验(三)

	(1) <i>L. AGD</i>	(2) <i>AQR</i>
<i>IV</i>	0.147 *** (3.257)	
<i>L. AGD</i>		0.937 * (1.861)
控制变量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 11.629, P = 0.0006	
	26.621	
Cragg-Donald F	(大于 Stock-Yogo 检验 10% 水平的临界值 16.38)	
Cons	5.884 (1.105)	-13.488 (-1.033)
N	371	371
R ²	0.602	0.797
Adj_R ²	0.580	0.766

①由于《中国审计年鉴》于 2012 年开始统计“被批示、采用的审计报告和专项审计调查报告”,且缺少 2013 年西藏数据,因此计算增长率所得样本量为 339。

②由于缺少 2013 年、2014 年和 2018 年西藏数据,因此样本量为 369。

提升国家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的能力^[22]。提出建议数量的增长率反映了审计机关主动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并促使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的动态过程,增长率越高,越能体现审计机关持续发挥“治已病、防未病”的监督效能。因此,以“审计提出建议数量”的增长率来衡量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JDJC2*)^①。回归结果见表7的列(3)。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来促进审计整改质量提升。

3. 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框架内,民主参与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为社会公众表达自身对审计整改的诉求提供了新渠道。本文参考朱颖等的思路^[23],使用相关检索词条的百度指数衡量公众的舆论压力。具体而言,结合审计整改相关研究,使用各省份“审计整改报告”和“审计整改情况报告”这两个关键词百度指数加总的自然对数(*Pub*)作为公众舆论压力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如表7的列(4)所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AGD*)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增强公众舆论压力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

4. 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

《中国审计年鉴》披露的“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这一指标能切实反映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的主体责任,其数量越多,表明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揭示的各类问题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有针对性地通过制度完善加以回应,而非仅对个别问题进行碎片化整改;同时,其数量积累体现了被审计单位在整改工作中投入的资源与精力,反映出将短期整改要求转化为长期治理机制的主动意识。因此,本文以被审计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的自然对数作为被

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的代理变量(*LnGZZD*)^②,具体回归结果见表7的列(5),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AGD*)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通过增强被审计单位的整改主体责任来提升审计整改质量。

(二) 异质性分析

1. 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对政府公共数据开放的应用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制度环境的优化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从而更好地释放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另一方面,相对于信息技术进步具有的不可逆性,制度环境则可能会出现倒退的现象,当制度环境较差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反而更能凸显出来。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是否会因制度环境不同而有所差异。

关于制度环境,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调查数据资料库”中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数据库2025》中的一级指标“市场环境”来进行衡量^③。依据中位数,将高于中位数的省份定义为制度环境较好组,反之则为制度环境较差组。回归结果见表8的列(1)和列(2),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AGD*)的系数

表7 机制检验

	(1) <i>PSCY</i>	(2) <i>JDJC1</i>	(3) <i>JDJC2</i>	(4) <i>Pub</i>	(5) <i>LnGZZD</i>
<i>L.AGD</i>	0.196 ** (2.310)	0.264 * (1.736)	0.057 * (2.020)	0.102 ** (2.373)	0.365 * (1.99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	0.573 (0.051)	-19.465 ** (-2.546)	-2.990 (-1.357)	-6.838 ** (-2.134)	-17.303 (-1.330)
N	339	369	370	371	362
R ²	0.067	0.245	0.187	0.757	0.681
Adj_R ²	0.011	0.201	0.140	0.743	0.663
F	8.399	12.946	51.529	179.564	102.503

①由于缺少2013年西藏数据,因此计算增长率所得样本量为370。

②由于缺少2012年青海省数据,2013年、2014年、2017年、2018年、2019年西藏数据,2015年、2016年吉林省数据,2017年海南省数据,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数据,因此样本量为362。

③由于《中国省份营商环境数据库2025》从2017年开始公布数据,因此样本量为217。

在制度环境较差的组中显著为正,且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这说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2. 人大预算监督

在当代世界各国的治理体系中,预算监督权始终是立法机关监督政府的核心手段,成为构建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关键支撑^[24]。具体到我国,人大预算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对审计整改情况进行监督。因此本文将进一步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是否会因人大预算监督的水平不同而有所差异。借鉴李一花等的做法^[25],使用其他支出占比衡量人大预算监督:其他支出占比较低,意味着人大预算监督较强;其他支出占比较高,则意味着人大预算监督较弱。具体测算公式为:其他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将全样本按照人大预算监督的中位数分成人大预算监督较弱和人大预算监督较强的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8的列(3)和列(4),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 AGD*)的系数在人大预算监督较弱的组中显著为正,且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说明在人大预算监督较弱的地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3. 未来导向文化价值观

不同的区域文化会影响该区域社会成员的意识 and 行为,进而作用于审计相关行为^[26]。基于“GLOBE”项目提出的9个文化维度^①,赵向阳等对我国各地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测度和衡量^[27]。其中,未来导向是指群体成员能够高瞻远瞩,关注长期利益而非短期利益,特别是当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出现矛盾时,会倾向于选择长期发展。一个地区的未来导向氛围,会影响到该地区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也势必会

表8 异质性分析

	(1) 制度环境 较差 <i>AQR</i>	(2) 制度环境 较好 <i>AQR</i>	(3) 人大预算 监督较强 <i>AQR</i>	(4) 人大预算 监督较弱 <i>AQR</i>	(5) 未来导向 较程度低 <i>AQR</i>	(6) 未来导向 较程度高 <i>AQR</i>
<i>L. AGD</i>	0.335 * (1.945)	-0.094 (-0.505)	0.042 (0.230)	0.523 *** (2.933)	0.061 (0.322)	0.479 ** (2.155)
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	P = 0.0364		P = 0.0083		P = 0.077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0.756 (0.039)	-9.821 (-0.257)	21.001 (1.212)	-4.010 (-0.301)	-9.865 (-0.559)	-14.568 * (-0.901)
<i>N</i>	109	108	199	172	191	180
<i>R</i> ²	0.150	0.219	0.141	0.411	0.335	0.246
Adj_ <i>R</i> ²	0.013	0.092	0.044	0.333	0.279	0.152

影响审计整改质量。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是否会因未来导向氛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按照未来导向指标中位数将全样本分为未来导向程度较高、未来导向程度较低的两组样本,回归结果见表8的列(5)和列(6),政府公共数据开放(*L. AGD*)的系数在未来导向程度较高的组中显著为正,且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这说明在未来导向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选取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可以有效提升审计整改质量,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可以赋能政府在落实审计整改中的组织领导责任;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通过促进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强化审计机关的监督检查责任、引发社会公众的舆论压力、增强被审计单位落实整改主体责任来促

①“GLOBE”项目是指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 Robert J. House 于 1994 年发起的 GLOBE 项目(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所构建的跨文化领导力研究框架,包含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权力差距、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人际关怀导向、绩效导向、小团体集体主义、性别平等和恃强性等九个文化维度,用于系统比较国家/地区层面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具体详见:https://globeproject.com/study_2004_2007。

进审计整改质量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对审计整改质量的提升效应在制度环境较差、人大预算监督较弱和未来导向较强的地区更为明显。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出以下几点启示:第一,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应考虑开设审计整改专栏,以数据开放赋能审计整改提质增效。其一,制定公共数据开放的战略规划,有序推进审计整改相关数据的开发利用。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统一开设审计整改专栏,明确专栏内各数据集的开放目标、范围、优先级及更新频率。其二,提高公共数据开放质量,推动数据开放与审计整改需求的精准匹配。针对“屡审屡犯”等共性问题,在审计整改专栏内开放多年度、多地区同类整改数据,并标注“高频复发”“行业共性”等标签,支持按问题类型、地区、年度进行筛选查询;针对民生领域审计整改,在专栏下增设“民生整改直达”等个性化子栏目,细分教育整改、医保整改、养老整改等子标签,同步标注群众关切与实时跟进标签,让数据开放更贴合实际治理需求。第二,相关主体应充分利用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加强对审计整改的责任落实,提升审计整改效能。其一,主管部门应全面落实对审计整改的监督管理责任。在审计整改专栏增设“行业整改督办”模块,建立审计整改数据与行业监管数据的交叉验证机制,并同步将督办情况与整改结果反馈至审计机关与政务数据管理部门;针对行业共性问题,在栏内搭建整改经验库,切实做到“治已病”和“防未病”。其二,审计机关应切实履行审计整改的监督检查责任,推动审计整改监督的数字化转型。在审计整改专栏嵌入审计整改监督专区,并分设“问题清单公示”“整改要求下达”“整改进展追踪”“整改结果验收”等核心子栏目,针对重大审计项目增设“专项整改督办”子栏目,方便其他主体查询与监督,提升审计整改效率。其三,社会公众应自觉践行审计整改关注责任,合理使用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进行审计整改监督。公众在积极关注审计整改的同时,应合理合法地在数据开放平台表达自身的建议或诉求,为官方监督提供补充视角,营造审计整改监督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 [1] 黄溶冰. 国家审计质量与审计整改机制[J]. 湖湘论坛, 2018(3): 104-113.
- [2] 沈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审计整改制度: 回顾与思考[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4): 1-8.
- [3] 王少华, 赵晓艳, 上官泽明. 互联网发展能成为审计整改质量提升的新动能吗——基于构建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的视角[J]. 会计研究, 2024(5): 166-181.
- [4] 上官泽明, 孙金鱼. 公众诉求如何影响审计整改质量? [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24(5): 75-82.
- [5] 郑石桥. 审计整改学[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24.
- [6] 邓金钱, 张甜甜. 数据要素共享与城乡融合发展——来自公共数据开放的经验证据[J]. 现代经济探讨, 2026(4): 119-132.
- [7] 刘烨, 王琦, 班元浩, 等. 公共数据平台开放能否促进财政透明度提升? ——来自市级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南方经济, 2025(2): 47-67.
- [8] 陈献东, 谢艺洁, 后小仙. 审计整改总体格局的三维阐释: 核心要义、内在逻辑与提升路径[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6(3): 14-23.
- [9] 钱弘道, 谢天予. 审计全覆盖视域下的审计法变迁方向及其逻辑[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9(3): 22-31.
- [10] 罗春华, 胡晋铭, 杨勇. 数字要素视域下国家审计效能提升研究——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6(1): 32-42.
- [11] 方锦程, 刘颖, 高昊宇, 等.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 管理世界, 2023(9): 124-142.
- [12] 彭华彰. 新时代审计整改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基于国家治理视角的研究[J]. 审计研究, 2024(2): 9-16.
- [13] 郑磊, 刘新萍. 中国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报告(2023)[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
- [14] 武恒光, 王良玉, 李学岚. 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吗——来自地方债信用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J]. 宏观经济研究, 2019(2): 46-68.
- [15] 池国华, 杨金, 谷峰. 媒体关注是否提升了政府审计功能?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 会计研究, 2018(1): 53-59.
- [16] 沈坤荣, 林剑威. 链“岛”成“陆”: 公共数据开放的技术创新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 2025(2): 83-104.

- [17] 徐玉德, 杨晓璇, 刘剑民. 地方官员变更、财政支出波动与企业系统性风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19(11): 3-16.
- [18] 张建翔, 王茂光. 以“数”赋能: 数据要素共享的普惠金融效应——基于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实验[J]. 华东经济管理, 2026(4): 31-41.
- [19] 湛仁俊, 周双双. 节能目标政策与区域协调发展: 来自中国企业的证据[J]. 世界经济, 2022(7): 205-232.
- [20]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21] 邢维全, 高原. 国家审计与区域创新投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6): 22-31.
- [22] 陈骏. 更好发挥审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完善国家安全体系[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1): 20-21.
- [23] 朱颖, 赵颖博, 邓淑莲, 等. 公众诉求与地方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研究, 2018(11): 90-105.
- [24] 林慕华, 马骏. 中国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预算监督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6): 73-90.
- [25] 李一花, 亓艳萍, 祝婕. 人大预算监督能改善地方政府债务支出效率吗? [J]. 财政研究, 2019(11): 37-50.
- [26] 郑石桥, 郑羽飞. 区域文化价值观对国家审计结果生产和运用的影响——基于区域文化价值观和地方审计数据[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1(6): 20-30.
- [27] 赵向阳, 李海, 孙川. 中国区域文化地图: “大一统”抑或“多元化”? [J]. 管理世界, 2015(2): 101-119.

[责任编辑: 黄 燕]

How does the Opening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Affect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Discuss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in Implementing Audit Rectification

SHANGGUAN Zeming, YAN Yiru, JIA Longfei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Audit rectification is the “second half article” of national audit. The division of audit rectification responsibilities is the bas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audit rectifi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at the same level bears the organizational and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among the many subjects involved in audit rectification.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ing platforms across provinces,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ing affects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pening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indicating that the opening of public data can endow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audit rectification. Th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opening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by promoting the competent departments to fulfill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responsibilities of audit institutions, triggering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and enhancing the audited units to implement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rectification.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mprovement effect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ing on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is more obvious in areas with poor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weak intensity of NPC budget supervision and strong future orientation.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s helpful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effect, mechanism and situation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ness on the quality of audit rectification, and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doing a good job of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repeated trial and repeated crime”.

Key Words: government public data opening; audit rectification quality; organizational and leadership responsibility; the supervisory and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he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responsibility; public opinion pressur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rectification